

# 经济改革需要提倡学术争鸣

奚兆永

对当前的我国学术界来说，程恩富与张五常商榷的论战性作品，具有开风气的意义。在我看来，程文对张文的辩驳是实事求是的，是雄辩有力的。这里，我想就双方争论的两个核心的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争论。

张五常先生说：“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他问道：“在那（哪）一个年代，那（哪）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有良好经济表现的共产政制？”他说，“从历史的经验看，没有其他成功的制度，而经济理论也没有其他可取的办法。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他还以东欧的捷克为例开导人们说，“东欧的捷史，开门见山，摆明要放弃共产，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只三年功夫就欣欣向荣”；“中国为了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形象而坚持这些资产的所有权为国有，代价实在太大了”，“即使国营机构不采用招标的办法，把资产出售，而把它送给职工——取之于民为国有，还之于民为私有——在道义上没有谁会反对的吧？”——总之一句话：社会主义（共产制）是最坏的社会制度，只有通过私有化实行私产制才是唯一出路。对于张五常先生的这些言论，程恩富摆事实、讲道理，通过新旧中国的纵向比较，新中国和印度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应该说，程文的批驳具有逻辑和事实的根据，是令人信服的。我想，张五常先生说的“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应该改动一个字，即把“劣”字改为“奇”字，是“共产制的经济奇迹，史无前例”。事实上，不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创造了并还在继续创造着经济奇迹，曾经实行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同样也创造过经济奇迹。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的4%，居世界的第五位，而到1976年，前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的20%，跃居世界第二位，许多重要工业产品如石油、煤炭、钢铁、化肥、内燃及电气机车、水泥等的产量更居世界首位，一些轻工产品如毛纺织品、皮鞋、砂糖等的产量也提高到世界的首位。试问，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要忘记，这中间还经历了国外战争，经历了损失巨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如此飞速的发展难道不是奇迹？张五常先生把捷克作为放弃共产制、推行私产制获得成功的样板，说什么“只三年功夫就欣欣向荣”，似乎私产制真的就是发展经济的“独步单方”，中国的改革除了私有化以外就别无它途了。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捷克斯洛伐克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把共产党执政时没收的财产重新归还给原来的业主，拍卖了小企业，并把大中型企业通过无偿平分投资券的办法实行私有，使80%的国有资产转为私有。结果如何呢？它并不象张五常先生所说的那么美妙——带来了“欣欣向荣”，而是带来了经济的大幅度下滑，物价的飞涨，失业的剧增，并因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统一国家的解体（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分解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当然，这种由社会的大变动所造成的经济滑坡和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的现象不会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但是说什么“只三年功夫就欣欣向荣”，却绝不是事实。1994年捷克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6%，而通货膨胀率仍有10.2%，

把这说成是“欣欣向荣”未免太夸大其词了。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无疑要好得多。这不是哪个人的看法，而是世人的共识。

说到这里，我还想着重指出一点，有关中国实行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是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斗争作出的历史选择。当然，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也并不是不要进行改革。为了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实现形式，当然应该进行改革，但是，这种改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绝不是对它的根本否定。

##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

张五常先生在其著作中一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发起攻击。如他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资本论》滔滔数十万言，还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劳力价值定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力价值定律’就被公认为谬论”；“我举出多个例子，把‘劳力价值定律’批评得一无是处了”。对于诸如此类的言论。程文均一一进行了批驳。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张五常先生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里存在着许多误解的成份。其误解之一，混淆了财富（使用价值）和价值。财富是指一切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资料，即使用价值。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除了劳动，土地（自然）也是财富的源泉之一。古

经济学的鼻祖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叫做“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因素，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对配第的这一思想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指出：这些见解所说的都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抽象劳动，而是作为物质财富源泉这一的具体劳动，总之，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而价值就不同了，它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里说的劳动，不是具有特定形式的不同质的具体劳动，而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意义上的耗费，是具有质的抽象劳动。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它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张五常先生显然没有分清财富（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不同，因此他才会认为价值“不是单从劳力而来”，还有“劳力以外的价值”。其误解之二，是混淆了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是在生产过程进行，有些生产活动虽然是在流通过程进行的，那也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的继续。离开了生产过程就根本谈不上价值的。可是张五常先生在举例批评劳动价值论时，几乎就离开了生产过程。比如他所举的邓丽君的例子就是如此。邓丽君作为“红透半天的明星”确实赚了很多钱，但是，歌星的劳动并不是生产劳动，它并不创造价值。正象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这是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问题”，与价值创造其实并无关系。张五常先生说“这种人是马克思理论解释不了的怪物”。其实，不仅马克思的理论可以毫不费力的解释这种现象，甚至不要等到马克思，亚当·斯密就早得多地解释了这种现象。斯密把与资本相交换因而能够生产利润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而把与收入相交换因而不生产利润的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资本家在工厂里雇佣的工人所进行的劳动，属于前者，它创造价值；资本家在家里雇佣的家仆，属于后者，它不创造价值。邓丽君的劳动和这类家仆的劳动一样，是与收入相交换的劳动，是一种不创造价值而只参与收入再分配的劳动。这种通过再分配获得的收入悬殊可能很大，但其性质却是一样的。正象我们不能说家仆剥削主人一样，我们也不能说邓丽君剥削了听众。至于歌星及其它一些职业的收入为什么会出奇的高，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也曾有所论述，许多分析至今仍是很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并加以革命的改造，不仅能够解释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世界，岂有不能解释邓丽君现象之理？！

张五常先生一再宣告他已驳倒了马克思的理论：他先是宣称，马克思已被他打得“片甲不留”；才过不久，他再次宣称，马克思已被他批得“一无是处”；时隔不长，他又出来宣布，马克思已“奄奄一息”！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马克思早就被张五常先生的“三招两式”打得“片甲不留”，又何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披挂上阵”？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批判“现代哲学教授”时讲的一句名言：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马克思的理论诞生 100 多年来，遭到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但它经久而不衰，显出其旺盛的生命力。1995 年 9 月，在法国开了一个“国际马克思大会”，全世界有近百家与马克思相关的刊物和研究机构，上千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同情者（其中有近 1/3 是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参加了大会。法国的两家大报《世界报》和《解放报》以及《人道报》都进行了整版的报道，其标题有的称“马克思没有死”，有的称“马克思引起了轰动”，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反应强烈。试问：世界上有哪一种理论能与之相匹？张五常先生拿他的老师科斯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并说“在马克思与科斯之间的一场智力角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科斯均全面胜出”。这番话真让人啼笑皆非。科斯的理论所涉及的只是一个极其有限的领域，且其真理性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有争议的，而马克思的理论引起了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并对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且还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把这样两个人相提并论，总使人感到有些滑稽。至于说科斯“全面胜出”而马克思已“奄奄一息”，那离事实不是太远的吗？

（作者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单位邮编：210093）

##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改革的理论基础

顾钰民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重大变革，这场变革能否使中国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充满生机和活力，高效率地发展，关键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改革，以及如何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关系。在经济、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理论上的论战是不可避免的。张五常教授以西方产权理论为出发点，对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及中国前途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他系统的理论观点。作为西方产权学派的理论权威和中国经济改革旁观者的张五常教授提出的关系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种种理论观点，不能不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张五常教授所担心的他的理论在整个中国没有几人能知道，他的“节目”在中国没有观众，看来是多余的。程恩富教授对张五常教授的观点提出的系统批评，其意义决不限于两位教授个人之间的学术观点之争，而实质是要澄清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以及依据什么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

###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因此，主张用西方产权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人，都